

“中体西用” 张之洞是如何做的

■朱至刚

张之洞之于中国的教育改革,不仅是思想者,还是践行者。也许也只有像他那样,将两者良好结合,方是改革的首选上策。

在近代中国的教育史和教育思想史上,张之洞是个怎么都绕不过的人物。相关论述有很多,对“中体西用”的探究更是其中大宗。

“中学为体,西学为用”是晚清士人在近代西潮冲击下慢慢形成的一个变革性共识:即中国传统的政教模式已不适应当时的局势,必须有所改变,有所革新,而既存思想或知识资源又不足以因应当下的变局,故变革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学习西方。不论是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还是“西学源出中国”等思想,都是希望在保持中国认同的基础上,为引进西方文化找依据。

梁启超曾说“中体西用”是“张之洞最乐道之”,在实践方面,张之洞亲力亲为,为近代政教的改革作了很大贡献,孙中山曾说,“张之洞是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”。

对于“中体西用”,张之洞又究竟是怎样身体力行的呢?

建新学制

所谓“学制”,是对教育的目的、方针、内容的具体规划。张之洞原是鼎甲出身,又自诩才具足以经营八表,他第一次出任外官就是到四川做学政。对教育既是内行,亦复热心,在清末的学制改革中,他不仅居功至伟,而且步步摸索,次序严整。早在光绪十五年(1889年),张之洞刚到湖



广总督任上就在湖北大兴学业。他不仅新建了两湖书院,而且在书院课程中逐渐增加西学内容,兼得书院式的通才教育和学堂式的专才教育两者之长。在新政以前,湖北已经开办了两湖书院、经心书院、江汉书院、自强学堂、武备学堂、将弁学堂、农务学堂、工艺学堂等兼采中西新旧的学校。

高层教育的全面展开,为教育改革往空间、往社会延展做好了人才和经验的储备。光绪二十八年(1902年)张之洞和湖北巡抚端方联名上奏《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》,在该规划中,湖北将兴办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两类学堂。基础教育分为初等、中等、高等三级。初等教育又分为蒙学和小学两级,小学分设初小、高小;中等教育则省城设文武普通中学各一所,各道、府、直隶州设模范中学堂一所。高等教育则将原有书院、学堂改为两湖高等学堂、武备学堂、将弁学堂。职业教育则分师范教育、实业教育和特别教育三类。该体系基本上是在仿效日本,但即便是仿效,也须相应的积累作为基础。正如时任管学大臣的张百熙所说,“张之洞留心学务最早,办理学堂亦最认真,久为中外所推重,是该督二十余年之阅历,二十余年之讲求,于学堂一切利弊知之较悉,自与寻常不同”。

正因为湖北办学业绩卓著,而且探索出来的路径颇具复制价值,在光绪二十八年(1902年)晋京期间,张之洞被特邀参加全国范围内新学制的制定。在他与张百熙、荣庆的会商下,该年七八月完成了新学制章程初稿。这就是从光绪三十年(1904年)开始执行的“癸卯学制”,这的确是最符合当时中国文教状况的学制。从湖北到全国,新学制从探索到成形,整整经历了十五个年头。

兴新氛围

据在光绪十七年(1891年)到光绪二十六年(1900年)就读于此的张知本

回忆,张之洞不仅对书院事事关心,而且务求造成尊学重教的整体氛围,以师生地位与待遇为中心。譬如书院的管理制度甚为整肃,如果学生二鼓时分尚未起床,宿管人员必来催促“老爷,二鼓啦”。当时仆役唤书院学生为老爷,唤自强学堂与武备学校学生为少爷,虽然颇有等级观念,却很能彰显学业、学术的地位。

对学生尚且如此,对教师就更是处处礼遇,各科教习至少能拿到一百两的月薪,每逢开学之期,张之洞必然莅临,至校门即下桥步行,先在孔子神位前行大礼,然后到至正堂。书院监督率教习立于西阶(也就是师位),接着官位尊崇、年逾花甲的张之洞代表学生家长,向教习们行叩首之礼!要知道这些教习不仅官位、年龄远不及他,而且颇多是他的授业门生。再如光绪二十六年(1900年)湖北首批官费留学生离鄂,张之洞亲自到轮船上送行,对学生频频答礼。提督张彪后至,屈膝请安,张之洞却口衔烟杆,视若无睹。这些姿态,虽有做作嫌疑,却能客观上造成对教育的敬重,乃至敬畏。有时候,教育本身的确需要被信仰。

在中国,学制的影晌从来不仅限于教育领域,而是会延伸到方方面面。改革的理念越新,规模越大,就越有可能与既有的利益分配格局发生冲突。须知在晚清,科举的地位仍然极其显赫。据钱实甫先生所编《清代职官年表》可知,有清一代,汉人要想入仕升官,是否在科举考试中获得功名,功名的含金量高低,实乃决定性的因素。新学制虽然建立了起来,但如果科举仍在,接受新式教育的学生必定仍被边缘。因此,张之洞在光绪二十九年(1903年)二月,与直隶总督袁世凯、两广总督周馥、湖北巡抚端方等人联名上奏,请求从次年开始,逐步减少科举中试名额,以期在九年后彻底停止。其实,

张之洞本人显然就是科举的受益者,他正是因为26岁那年考中探花,才能沿着既有的高官培养路径一路青云直上,年方不惑即为巡抚,刚过五十就做上了总督,但是为了公益,他却能毅然斩断自己的来路,须知这样做,不仅要承认巨大压力,而且对他的个人利益有损无益,个中见识可佩,勇气更是可嘉。

立新体制

在入仕的体制上,张之洞的主张还有破有立,很妥当地安排了其间的过度

和更迭。在他的倡导下,光绪二十九年(1903年)十一月,中央政府颁布了《各学堂奖励章程》。该章程很明细地规定了按毕业学堂的级别和毕业考试的等级,授予学生相应的功名以及任官资格。例如在最高一级的通儒院毕业后,可等同于散馆后的翰林,获得优先出任中级官员的资格。最低一级的高等小学堂毕业生,也可获得生员

(也就是俗称的秀才)功名,并按政策享受国家补助。新体制与旧体制的对接设置得相当完善,这样既切实推进了改革,又有效地避免了动荡和不安。

学制、功名体制的更改相互配套,同步推进,借助体制的力量,中学和西学在教学内容中各得其所,“中体西用”的观念,自然得到了切实的普及和接受。从此以后,中国的读书人研习西学,不但名正言顺,而且再无生计和社会地位上的后顾之忧,不用再像早年的严复那样,虽是西学泰斗,却一直相当边缘,甚至还要在乡试中屡败屡战。

就此而言,张之洞之于中国的教育改革,不仅是思想者,还是践行者。也许也只有像他那样,将两者良好结合,方是改革的首选上策。■

(作者系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)